

高学费、约车难、通过难、直考驾照难实现 昆明：学车考驾照遇“八十一难”

本报记者 黄榆

“昆明规定驾校收费最高不超过4685元，但现在几乎没有低于6500元的，最高的甚至超2万元。”近日，记者采访到的许多昆明市民和正在学车的贺璐一样，对驾校的高收费颇多怨言。

今年以来，随着号称“史上最严”驾考新规的实施，垄断驾考市场的驾校培训费普遍上涨。广州将整合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和新农合制度，2015年实现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全面并轨，农民和城镇居民将享受统一的医保保障标准。

“不给教练买烟、送红包，他根本不理你”

对于驾校收费最高不超过4685元的规

定，昆明市客运管理局解释，机动车驾驶培训收费，是以学员实际学时计费，由学员实际学时决定，“最高限价”是最低学时内的培训费、考试费和杂费。由此，驾校学费高于最高限价似乎顺理成章；因为很多学员在驾校学习，要历经重重难关，很难以最低学时学满通过。

学员经历的第一难便是“约车难”。石宏在2013年就报名昆明某驾校，但直到今年3月份才上车。他对记者说：“每次给驾校打电话约车，驾校总说已经约满了，上车很难。每考完一科，驾校又让你等上几个月再考下一科。”

“报名时，驾校态度很好，承诺短期内即可上车，但等到报名成功后，能摸到车就变得遥遥无期了。每次驾校都以人多约满为由延期，但既然人多短期内安排不过来，为什

么在报名的时候不明确告知学员呢？”和石宏有着类似经历的张勤也认为，驾校一旦吸引学员报名缴费成功，对于学员什么时候能学满毕业并不关心。

让石宏感到更烦心的是，“教我的那个教练不给买烟、送红包，根本不理你，如果通过了一科，他还直接问你要红包。”记者了解到，学车过程中驾校教练的“吃拿卡要”已经成为行业普遍现象。这是学员们要经历的又一难关。

刚刚拿到驾照的高志翔告诉记者，自己花了一年多时间、一万多元才考完所有科目。“驾校乱收费太普遍了，你投诉驾校或者教练，他们就抱着不让你考试，给你各种小鞋穿，那你花的时间、金钱就更多。”

据记者了解，这些弊端并非昆明特色，在

全国都很普遍。

直考驾照“是个美丽的愿望”

有人萌生过绕过驾校直考驾照的想法，但“这只是个美丽的愿望”，曾经做过这方面努力的昆明市民周军生这样评价。

虽然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部门公布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只要符合规定的年龄和身体条件，持本人身份证和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都可以到车管所进行申领驾照的考试。

但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中规定，在道路上学习驾驶，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线、时间进行，在道路上学习机动车驾驶技能应当使用教练车，在教练员随车指导下进

行，与教学无关的人员不得乘坐教练车。

昆明雄霸驾校一位杨姓教练认为，交管局局提及的三个必要条件都需要在驾校内才可行，“首先，驾校报名人数一直人满为患，教练也难以抽出空去到外面单独教学。其次，驾校的教练车属于驾校名下，教练不得私自驾车出去带学生。”

周军生也说，即便你找到了有资质的教练，教练车也不是随便可以获得的，到时候还是得找驾校才行，而驾校一般都没有私教，最后考试还是得到驾校报名才行。

在这些考驾照的学员看来，考驾照必须上驾校是一种巨额培训利润驱动下的垄断行为。不少地方为了庇护驾校行业的巨大利益，出台的一些驾驶学习的“限制性规定”，让申领驾照的人只有“自古华山一条路”。

但业内人士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驾照考试之所以设置了层层条件并将学员最终引向驾校，最根本的原因是涉及道路交通安全。

昆明某驾校负责人黄崇华表示，“驾驶员培训的技术含量虽然并不很高，但事关公众交通安全，如果完全放开驾培市场，安全教学、管理、保险以及后继责任追究等问题就可能出现混乱，于公共利益不利。”

湖南湘潭校车交通事故赔偿方案初定

遇难幼儿每人获赔56万元

新华社长沙7月13日电（记者阳建、刘良恒）记者13日从湖南长沙和湘潭多个部门证实，日前发生的湘潭幼儿园校车事故的赔偿和救助方案初步确定，每个遇难幼儿获赔56万元。目前，长沙市岳麓区所负责的5个遇难幼儿的赔偿协议已签署，湘潭方面的赔偿协议正在协商中。

7月10日，湘潭市雨湖区响塘乡金桥村乐旺幼儿园一辆校车，在途经长沙市岳麓区含浦镇千子村时翻入水库，致车上11人死亡，其中包括8名幼儿。事发后，当地有关部门立即启动了善后事宜。据记者最新获悉，长沙方面已与所负责的5个遇难幼儿家属签署赔偿协议，每人获赔56万元。湘潭方面给所负责的3个遇难幼儿提出的赔偿金额与长沙一致，也为56万元。

另据了解，遇难的另外3个成人的赔偿方案与幼儿不一样，相关细节尚不清楚。

据湘潭市有关部门介绍，乐旺幼儿园2010年开办，在湘潭县教育局办证。2011年1月响塘乡划归雨湖区，2011年4月11日在雨湖区教育局换证。

鞍钢追授孙利东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本报讯（顾威 周军 刘金宇）日前，在鞍钢集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暨“三先两优”表彰大会上，在火灾中救人牺牲的工人孙利东被追授为“鞍钢集团公司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5月13日17时30分，孙利东在鞍山市铁西区同兴街日新小区5号楼2单元11层抢救一位被困火灾中的老人牺牲。

据了解，孙利东多次被评为东鞍山铁矿优秀共产党员，3次夺得鞍钢矿业公司电机车司机技术状元，两次获得鞍钢矿业公司“两革一化”能手称号。

“社会协力公益四川”恳谈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高柱）日前，“社会协力公益四川”恳谈会暨首批“协力公益伙伴”签约仪式在成都举行。四川省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邀请到基金会、社会组织、爱心企业等作为“协力公益伙伴”，与130余家单位达成合作意向。

据了解，四川省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成立于芦山地震后，该中心旨在整合政府、群团和社会资源，凝聚社会正能量，打造公益项目、开发公益产品、供给公益服务、传播公益文化。成立3个多月来，首期募集资金752万元。

民3名”。“下令追击向西方逃避的住民，结果射杀住民3名，射伤3名”。

“我于1937年4月起至1945年9月3日止，参加日军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恶事实，统计于下：即杀人总数为831名。杀人对象内计：男住民420名，女住民14名，民兵98名，八路军兵员252名，抗日军兵员38名，俘虏兵员9名”。杀人手段计：射杀、刺杀、斩首、烧死、摔死、饿死、瘐死（坐监狱而死）。

“伤害总人数为：519名”。手段是：射伤、砍伤、踩地雷炸伤、刺伤。

“强奸中国妇女人数合计为34名”。

“逮捕了住民的总人数为112名，此外在战场上俘虏兵员的人数为368名，这些人送往后方后的处理情况不明，尚有逮捕、抓捕的经过拷问和殴打审问的人数为住民215名。此外抓捕和平住民作为踩地雷、领路、当马夫、担挑行李、以及无偿代奴役其修筑军用汽(车)路和筑城工事的人数有1171名”。

“对八路军在战场上使用过毒瓦斯(赤筒12个)一次一件”。



游客大军“攻陷”沿海浴场

7月13日，暑期旅游高峰的第一个双休日，青岛各个海水浴场、崂山、海底世界等景点全面迎来暑期旅游高峰。在青岛第一海水

浴场，游客大军“攻陷”沿海浴场，下海冲凉的游客如同“下饺子”。

王海滨/CFP

中央档案馆公布日本战犯相乐圭二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中央档案馆13日公布了日本战犯相乐圭二的侵华罪行自供提要。

据相乐圭二1954年11月笔供，他1916年出生在日本福岛县。1937年4月驻扎伪满洲国三江县。1938年7月起任步兵少尉小队队长、中尉中队长、警备队长、代理大队长、大队长等职。日本投降后，投闯锡山部，任少将参谋长、团长等职。1949年4月被俘。

重要罪行有：

1938年7月27日，奉大队长“要好好地斩杀”之命，参与对八路军俘虏的斩杀行动。“我就用军刀砍死了其中的40岁左右像个农民的人1名”。

1938年10月26日，由南官县向新河县进攻之际，“我用军刀砍下了在凹地里隐藏的1名青年住民的手臂”。

1940年5月，在神池县，“射杀便衣民兵3名”，“在八角堡南门外枪杀了中队从大严备镇附近逮捕来的民兵2名”。

1940年7月，在朱家川一带抓捕了12名住民审问拷打，后“以刺刀刺杀了8名，射杀了4名”。另外，还“逮捕了行官墙附近住民约70名左右，于行官墙东边约1000米地方，把其中30余名用土埋其半身，以机关枪扫射，全部把他们杀害了”。另本部的和泉军医中尉和条田卫生军曹共同将八路军休养所中1名重病员“作为活人解剖手段把其杀

“第一次”的终结与确立

（上接第1版）

用《劳动法》起草小组负责人，时任劳动部副部长张左己的话说：“我们终于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劳动法》”。

而已故著名劳动法学家关怀教授曾激动地宣称：“《劳动法》的颁布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使我国劳动法制度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事实恰如关怀教授所言，劳动领域自此终结了以往为应急而制定劳动行政法规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告别了仅仅依靠劳动法规调整劳动关系的尴尬岁月。同时，开启了我劳动法制建设的“新时代”。

在《劳动法》之前，我国没有法典性质的《劳动法》，这使得我国的劳动立法体系一直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长期处于滞后状态。而《劳动法》作为一部全面调整市场化劳动关

系、规范劳动行为的劳动基本法律，它的出台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特别是它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制度和规范，为后来制定《安全生产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法》等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明确了立法方向，提供了重要源头，我国劳动立法体系由此趋于完整，逐渐形成了以《劳动法》为主体、多层次的劳动法律法规为补充的劳动法律体系，护航我国劳动关系进入法治时代。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胜俊在纪念《劳动法》颁布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评价《劳动法》“填补了我国法治建设的空白”。

而让立法者更加感到欣慰的是，即便在今天，《劳动法》所蕴含的法律精神、原则方向，依然充满了生命力。

宁波：“悬空楼”变身“学区房”重新开卖

（上接第1版）

质量如此糟糕，被认定“不适合居住”的房子为何还在出售？宋诏桥置业总经理曹先生此前回复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没钱开发只好卖楼”。按照他的说法，公司原计划把桑园小区全拆重新盖楼卖，但由于70多户居民仍在居住，拆迁方案批不下来。拖了7年之后，“公司实在顶不住了只好卖楼。”他还表示，“房子虽然有瑕疵，但问题不是太严重，又不会倒的”。

而负责联系宋诏桥村的中河街道办事处综治科科长严红杰，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桑园小区存在地面下沉等质量问题，但

还算不上危房。现任村书记缪坤云说，宋诏桥村以前集体经济实力雄厚，在鄞州有第一村的称号。如今因为这个改造项目，人财两空。之前以为桑园小区不合格，所以村里只得另外再造了一个“永佳苑”，为此欠下一亿多元。

更为蹊跷的是，上个月，有网友向鄞州区政府申请信息公开，希望了解桑园小区相关情况。但作为规划主管部门，宁波市规划局鄞州分局给出的答复是，桑园小区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小区设计图纸“经审查无该信息”。而在此之前，鄞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确认，桑园小区项目竣工资料未在其城建档案存档，查不到相关信息……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乌梦达 张丽娜 杨绍功

住房公积金缴存的差距鸿沟有多大？记者在内蒙古省级贫困县杭锦旗调查得到的数据显示：当地职工缴存的平均水平不足1000元，但当地供电公司职工最高缴存达到15530多元。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和垄断行业不顾国家明文规定，超比例超缴公积金，涉嫌违规缴税和变相发放福利。

贫困县垄断行业违规超缴公积金

内蒙古杭锦旗2012年才从国家级贫困县调整为省级贫困县，记者调查检索到该县供电公司2014年3位领导和2位职工的工资，都超过40000元。工资最高的一位领导月缴存公积金达到15530.26元，一位非领导岗位普通员工的工资42000元，每月缴存公积金总数12000元以上。而杭锦旗所在市2013年度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仅为5574元，公积金缴存的平均水平不足1000元。

按照住建部公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公积金月缴存额为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乘以缴存比例，不低于5%。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等部门2006年规定，单位和个人分别在不超过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12%的幅度内，实际缴存住房公积金，允许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同时规定，作为缴存基

数的月平均工资不得超过职工工作地所在设区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

据此计算，该供电公司个人和单位最高缴存额度分别不能高于2006元，即总数不能超过4012元。

此间专家表示，该单位违规为职工超额缴纳公积金，相当于变相发放了巨额福利；而该单位的天价工资，涉嫌以多发公积金逃税少缴的个人所得税金额也数额巨大。通过“多交钱少缴税”，每月发放的福利总计超过14000元。

实际上，当地出现类似问题的远不止供电公司一家，记者粗略检索发现，当地以超比例、超基数违规缴纳公积金涉及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以及供电、矿业等垄断行业，缴存基数多在20000元以上。

制度弹性拉大缴存差距

公积金制度出台20多年，发挥的作用不容置疑，但由于制度弹性大，执行过程中不断出现违法违规现象，“不公平”的一面逐渐暴露出来。记者调查发现，公积金制度“弹簧”的随意伸缩，正在不断加大各个群体的缴存差距。

——行业差距最悬殊。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所有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均应依法足额、按时缴存住房公积金，但现实中并没有做到。效益好的、国有单位和机关愿意多缴、报高基数，效益不好的单位或不愿意多缴的单位报低基数，或按照下限缴。

与杭锦旗供电公司最高达15000多元的公积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在不少人力资源公司挂靠的外来务工人员，每月公积金缴存只有100多元，最少的只有20元。

据武汉市审计部门审计，公积金缴存额度行业排序靠前的是金融、电力、燃气及供水等行业，缴存额度靠后的是居民服务、制造、住宿和餐饮、批发和零售。

而缴存不公体现最突出的就是私有企业，往往少缴甚至不缴。内蒙古某地级市统计，缴交公积金的单位有1141个，参与缴存的个体私营单位才108个，不到10%。这种情况在全国十分普遍。

——制度弹性造成差距。《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财政部、税务总局的有关规定，将公积金缴存额度限定在5%—12%，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执行，这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制度弹簧：有钱的多缴，没钱的少缴或不缴。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省份执行了国家规定，但也有部分省份根据“需要进行调整”，最高的缴存比例已达到25%；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工资基数也不一致，有的地方采用的是基本工资，有的地方是职工的津贴和工资之和。

别让“隐性福利”冲击公平底线

专家表示，公众对公积金“不公平”的最大感受就是缴存的鸿沟，尤其是公积金在一些高收入的国企已变相成为增加职工收入的渠道，尽管有关部门三令五申，但对于是否采取“限高”政策，业界和管理部门却看法不一。

“公积金执行中所反映出来的缴存不公，根子在收入制度。”内蒙古赤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林蔚说，公积金必须遵循“横向公平性”原则，不能再对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产生二次放大效应。如果收入分配很难短期内实现公平，亟待统一的就是公积金缴存比例和基数范围，防止公积金异化为过度福利的工具。（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